

李大釗選集

李大釗選集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李大钊选集

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18 $\frac{1}{2}$ · 插页 11 · 字数 394,000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0 定价（大）2.50元

统一书号 17001·28

題李大釗同志選集

登高一呼群山應，
從此神州不陸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
微言如肉首傳真。
特挈改理合南北，
未許主法混法清。
吾有胸中無限事，
敢拋熱血護新生。

徐伯渠

一九五八年

十月九日

題李大釗同志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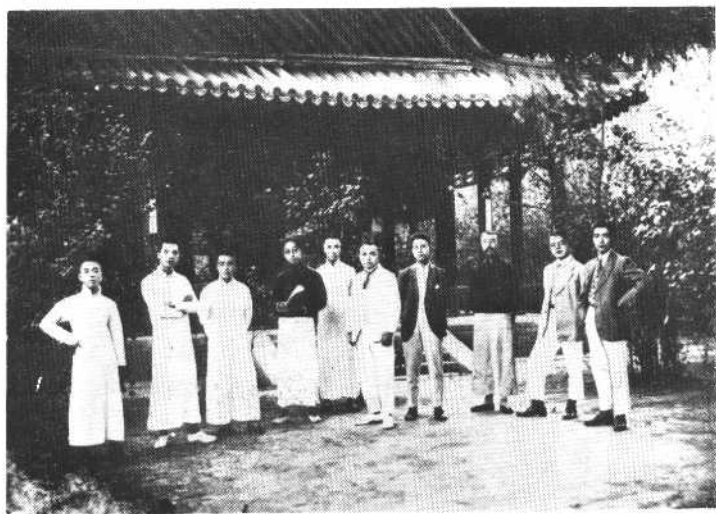
“青春”之氣，
萬古常春。

吳玉章





李大釗同志 1905 年入永平府中學，
這是他在該校讀書時所攝。



李大釗同志 1919 年与“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合影于北京。
“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传播新思想的社团之一。右起第
三人是李大釗同志，左起第二人是邓中夏同志。



就义前的李大钊同志

鐵肩擔道義
妙手著文章

守常李大釗

李大釗同志手迹

出版說明

“李大釗選集”是為了供研究現代思想史和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的參考而出版的。

編入本書的文章，包括作者自 1918 年至 1926 年的論文、演講、雜文、講義等，共一三三篇。

所有的文章，都是按寫作和發表的時間順序排列的。日期一律改用公曆。每篇文章之後都註明文章的出處和作者的署名。

李大釗同志的遺著散見當時各報紙雜誌，搜集比較困難。最早進行這一工作的是李樂光同志和方行同志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又作了補充和訂正。現在出版的選集是以他們的工作為基礎的。

李大釗同志生平事略

大釗同志，字守常，1888年10月6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父母早亡，依靠祖父过生活。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在那里，他较为广泛地接触到了当时所谓的新学，对社会生活也有了较多的了解，表现了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了人心。但是这个革命是很不彻底的，它“只把一个皇帝赶走，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552页）大釗同志在当时的沸腾的政治生活中，就看到了新的共和国的“隐忧”，表现了他对于祖国命运的深刻的关怀。他在1913年发表的文章中就以极其愤怒和沉痛的心情，揭露了北洋军阀盗窃国权、侵蚀共和的罪恶行为。他尖锐地指出，辛亥革命的结果，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自由：“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1913年冬，大釗同志得到朋友的资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留学日本期间，大釗同志那种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他所发表的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他曾在日

本东京发起組織“神州学会”，进行秘密的反袁活动。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凱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大釗同志得悉这个消息后，立刻奋起反对，編印了“国耻紀念录”，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同时，还散发了“警告全国父老書”。在这些文件和論文中，大釗同志列举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系列活动，揭露了“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質，号召国民奋起自救，用“臥薪尝胆”的精神和“百折不挠之志气”，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鼓励国民“勿灰心，勿短气”，坚持到最后胜利。大釗同志积极从事反对卖国贼袁世凱恢复帝制的斗争。他严正地駁斥了美帝国主义代言人古德諾所謂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治的謬論，抨击了那些拥护袁世凱的“毀新复古”之徒，并大声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国民死，专制活則自由亡。”而所謂“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輩”一律是“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对于这样的丑类必須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所有这些，突出地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本色。

1916年夏，大釗同志回国后，曾被聘担任北京“晨鐘报”（后改为“晨报”）編輯（時間很短），并且立即参加了由“新青年”发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大釗同志积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真理，反对封建迷信、主观武断和盲目服从；宣传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反对消极保守的落后的人生观；并热情地歌頌了新生力量，相信新生力量一定战胜腐朽势力。在“‘晨鐘’之使命”、“青春”等文中，大釗同志以不可遏止的热情，表现了他那种迫切要求“青年中华”独立解

放的强烈願望，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旧学說之囹圄”，站在民主自由的最前列，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他希望中国青年必須怀抱“乘风破浪”的伟大气魄，打掉民族自卑感，“前进而勿顧后，背黑暗而向光明”，去为人类造幸福。他相信中国的进步是无穷无尽的，“青春中国”的“再生”是必然的。大釗同志这种对未来的信心、希望和乐观主义精神，对于激励中国青年的进取心，起了非常良好的作用。

1916年秋，保皇党人康有为上書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大釗同志連續发表文章，反对“尊孔”，認为孔子是数千年前的“残骸枯骨”，是历代帝王专制和封建家族制度的“护符”，把孔教列入宪法，完全违背了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大釗同志还把反对尊孔的斗争，扩大到对整个封建倫理道德的批判。他指出，宇宙是无始无終的“自然存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現象（无论是自然現象或者社会現象），都是发展和变化着的，道德的演化也必然要遵循这个規律。“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因此，凡是旧道德，在当时也許是进步的，但到了今天就没有可取的地方了。为了便利新道德的确立，对于一切陈腐的、僵死的旧道德，必須加以“人为之力”，促使其迅速崩潰，“虽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

大釗同志坚定地相信，新生事物在誕生之前，必然要經過一番艰难困苦，但終将冲破障碍，得到发展。他反对一切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宣传真理的“权威”，指出无论是社会輿論的压迫，法律的禁止，始終掩盖不了真理的光輝；真理是一定要胜利的。因此，为了追求真理，为了革命，就不怕“断头流血”。

1917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大釗

同志由于他所具有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信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很快就認清了这一革命的实质，并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观”一文中，就闡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同年11月，他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維主义的胜利”这两篇著名的論文，竭力贊揚十月革命，热烈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他明确地指出，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已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中国人民应该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接着，他又发表了“新紀元”和“战后之世界潮流”等文，說明无产阶级革命是二十世紀不可抗拒的潮流。大釗同志这些文章，代表着中国先进分子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的良好开端，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新的觉醒。

1919年初，大釗同志在“大亚細亚主义与新亚細亚主义”等文中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他一針見血地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所提倡的“大亚細亚主义”的侵略本质，指出“大亚細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而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而是并吞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細亚的民主主义，而是日本的軍国主义。他号召亚洲被压迫和被奴役的人民，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清楚地看出了帝国主义必然要死亡的命运。他明确地指出，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殖民地附屬国对帝国主义宗主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强大民族要求解放，乃是这个时代的不可抗拒的潮流。这种認識是五四爱国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前提之一。

“五四”前夕，大釗同志已經認識到了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劳动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輸到社会里面，非把智識階級与劳工階級打成一气不可”。在“現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他要求青年看清世界发展的潮流，明确努力的方向，他說，現在世界上最苦痛最悲慘的人就是那些劳动的人，所以“我們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慘的声音走，我們要曉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然后“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

大釗同志是“五四”前后革命文化活动的积极的組織者和指导者。1918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經濟学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得到了在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从事革命活动的机会。同年参加“新青年”杂志編輯部，并与王光祈等人組織了“少年中国学会”。为了配合“新青年”的反封建斗争，又与陈独秀等創辦了“每周評論”（創刊于1918年12月），协助全国学生救国会出版了“国民”月刊（創刊于1919年1月），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出版了“新潮”月刊（創刊于1919年1月）。1919年2月，“晨报”改組了第7版（副刊）以后，由大釗同志負責編輯。在他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下，“晨报”副刊于1919年5月1日出版了“劳动节紀念”专号。这个“专号”发表了大釗同志的“‘五一节’杂感”，第一次扼要向中国人民說明了“五一节”的由来，預測了中国工人运动必将得到蓬勃的发展。

在“五四”前，大釗同志所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和宣传鼓动，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动，起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在五四运动中，大钊同志高举反帝的旗帜，向帝国主义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他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坚决地揭露了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强盗分赃的本質，斥責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所謂和平綱領“十四条”的騙人的鬼把戏。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敌人不仅有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在整个帝国主义的“强盗世界”，喊出了打倒“强盗世界”的口号。

五四爱国运动，特别是“六三”中国工人阶级政治大罢工，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打开了广阔的道路。五四运动后，大钊同志在“每周评论”和“新生活”上发表了許多短小精悍的杂文，向反动统治势力进行猛烈的攻击，号召中国人民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同时在“新青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內容，并特別強調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阶级斗争学說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諸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的一条金线”。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宣揚他的一点点的改良主义的主张。大钊同志立即在題为“再論問題与主义”的公开信里給胡适的謬論以严厉的駁斥。他明确指出，要使中国社会制度得到根本的改造，必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彻底的革命斗争。“問題与主义”之爭，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最早的一場論战，是共产主义知識分子与资产阶级右翼知識分子的公开决裂。大钊同志在这次論战中坚守了马克思主义陣地，击潰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从1919年底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大钊同志发表了不少宣传